

永新文广局 永新文化馆 编

吴谷 主编

永新文广局
永新文化馆 编

吴谷 主编

红永新

主编 吴谷

永新文广局
永新文化馆 编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永新

序

永新，一团燃烧的火 一面火红的旗

周 嶙

去年，吴谷先生将他主编的《永新名胜名产传说诗文选》交在我手上，要我为其写序时，我读后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向往。今天，他又将一本仍是由他主编的《红永新》交在我手上，要我再次为这部书写序，读后，我产生的却有一种澎湃的激动。

我所向往的是永新有那么多的名山秀水，那么多的人景传奇，那么多的名人骚客……

我所激动的是永新有“长征逾万参加者，烈士八千磊落才”的无数佳儿女……

我曾来过永新两次，今年秋季，我就是带着这种强烈的向往和澎湃的激情再次扑进了她的怀抱。

这个怀抱是热的，热得烫人，热得温馨，热得令人心旷神怡……

这次我是专程到永新采写第一个上井冈山的永新籍双枪女红军贺子珍英雄事迹的。一到永新，县文广局主要领导虽出差在外，但他专门去电指示局里派车派人为我的采风提供了最大的支持；而该局网络公司和局稽查大队的领导都以老区人特有

的无私与热情给予了我极大的方便……

从中我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永新人的热忱与豁达，永新人的风范与崇高。

《红永新》这部近30万言的长篇巨著，详细地记录了永新人民从土地革命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无疑对推介永新，让后人和更多人了解永新，打开了一个透明而晶亮的窗口。这是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工程。我为永新的文化决策者们鼓掌！

吴谷先生在广州曾做过多年的主编，他所主编的各类图书都有着独特的风格和技艺。这部《红永新》，他紧抓“红土、红地、红根、红源”这个贯穿全书的主核，多层面地展示永新人民在各个斗争时期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读后令人感动，令人刻骨铭心，更能让人们了解永新为全国四大将军县之一的根源与辉煌。

她是一部追记历史，启迪后人的好书。因此说：

永新是红的，

永新是热的。

永新是一团燃烧的火，

永新是一面猎红的旗。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作家
广东《民生报》总编)

上 卷

红土·红根

沃土，孕育着火苗
火苗，融汇着热血。
火，燃红了这片热土，
血，染红了这片土地。
永新无数佳儿女，
在耕耘着红土，
在种植着红根。

红土

——土地革命时期的永新

烈火旺 · 沃土红 · 红根谱
暮云沉 · 红土愤 · 播火人

MU LU 目 录

序 1

上 卷

红土·红根

红土

暮云沉	1
红土愤	9
播火人	14
烈火旺	19
沃土红	35
红根谱	38

红根

红枫劲旅	77
星火点点	91
三打永新	106
经营永新	123
红根谱	144

下 卷

红地·红源

红地

割区烽火	151
反围剿壮歌	165

MU LU
目 录

风雪游击战.....	188
红根谱.....	198
红源	
出征.....	237
怒吼.....	248
解放.....	261
红根谱.....	266
后记.....	298

暮云沉

教会势力的横行·封建
豪绅的压迫·神权族规
的枷锁·封建土地的剥削

永新·永新

永新县位于江西西部，东与吉安县、泰和县交界；南与宁冈镇、井冈山市相连；西与江西的莲花、湖南的茶陵县毗邻；北与安福县接壤。东西长 160 里，南北宽 140 里。总面积 2186.7 平方公里。属半山区半丘陵地区。地势中部低，南北高。西北的秋山峰海拔 1391.3 米，地势最高；北部的罗霄山脉，绵亘西南、南部和东南部，千山万壑，一望无际。曲折蜿蜒的禾水河由西向东横贯中部于白堡出境，流入吉安，注入赣江。自古以来，永新由于地处“吴头楚尾”，扼湘赣交通

要冲，历为兵家必争之地。

永新县历史悠久，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为楚疆，秦属九江郡，汉为豫章郡，建县于汉末建安四年至建安二十年之间，迄今已一千九百余年。

永新境内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盛产米、竹。高等资源植物有一千余种，还有不少珍贵稀有植物及树胶、芳香油等原料。矿藏资源有铁、煤、石灰石、石膏等。位于西部的乌石山铁矿储量丰富。年产矿石在六万吨以上。

永新全县耕地面积 44.2 万亩，其中水田 40.5 万亩。粮食生产主要以产稻谷为主，经济作物茶、油茶、棉花、黄豆、红薯芝麻等是永新历史上的传统作物。

永新土地革命时期有人口 27 万，全县现有 48 万人口，除有极少数的回族、苗族、壮族、满族、纳西族、达斡尔族外，大都为汉族。

永新人民世代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劳动、生息。他们在苦难的生活和长期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斗争的磨练下，人民勤劳，朴实，具有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然而，永新，虽然物产丰富，人民勤劳，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里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人民饱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教会势力的横行

一八八六年前后，帝国主义宗教势力开始闯入永新。起初是天主教在埠前的长湖田及胡家村一带活动。次年，便正式在县城设立了教堂，继而在茅坪、里田等地设立了支堂，广泛吸收教徒，日益发展教务。至二十世纪初年，永新的天主教徒发展到二、三千人，声势

越来越大。

随着天主教徒的侵入，福音教徒也踏进了永新的大门。初在西乡的汤溪下汪村活动，一八九九年侵入永新县城，在城里设立了福音堂。并先后在里田、潞江、烟阁、石桥等地设立了支堂。至二十世纪初，发展了教徒数百名，其声势虽不如天主教之盛，但是其影响并不亚于天主教。他们各自在县城开办了学堂，招收男女学徒，宣传基督教教育，进行文化渗透。

这些传教士表面上装得那么慈善，内地里却以发展教务、宣传教义为名，收集经济情报，鱼肉乡民。并利用教会势力，包庇坏人坏事，唆使教徒逞凶掠夺。如永新屠户罗品贤品质恶劣，横行霸道，县城人民都视他为地痞。而他信教以后，依仗教会势力，包揽词讼，专门挑起事件，从中压榨人民，成为永新一大恶棍。横江塔下村的天主教徒陈××与族人争夺产业，由于教会的庇护，不仅强迫县官将产权断归给他，还需对方放鞭炮办酒席赔礼。城西刘三保、刘四保兄弟二人前清末兵痞出身，自投奉天主教后，居然在城厢附近独霸一方。不仅任意欺榨一般平民，就连清末举人左永冕的产业也被他两兄弟恃强霸占。那时长湖田的一个十四岁蒙童刘明道对该村教徒刘毛口，占据公地修教堂，仗教会势力欺压人民实在气愤不过，写了一块“邪说误民”的横匾和“背其天，弃其性；人者主、出者奴”的对联，痛斥教会的罪恶。当外国神甫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刻要求县官罗大勉捉拿刘明道办罪。若地方官吏不听教会的指使或触犯了教会的侵略利益，教会就直接采取高压手段当场加以侮辱，硬是强求上一级的中国政府给予处罚。如清末光绪年间县令阎××（四川人），就是因为这种情形而被天主教外国传教士活活逼得吞金自杀的。临死前还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来表示自己内心的悲愤和对教会的淫威的控拆。其中有几句是“离家五千里，孤魂何所之，回思读

书日，那悉有今兹。”

教会势力也同样使中国凶恶的封建军阀感到害怕。如一九二三年，广西军阀沈鸿英部在永新大街上捉拿挑脚，但对替教会做工的泥木工人一个也不敢捉拿，甚至连追捕的过往行人只需一脚踏进教堂工地，追兵就不敢捉拿了。因此当时人民把教会比作是“国中之国”，把传教士当作“王中之王”。

帝国主义的教会不单在政治上、精神上和肉体上欺压永新人民，并且在经济上也巧取豪夺。从清末到民国初的数年当中，天主教堂仅在县城就以强占公产、强买民田等手段，霸占了近二百亩土地，福音堂在城内和四乡也强占了不少地皮。他们甚至还自由圈占了七溪岭上的蛤蟆湖作为外国传教士的夏令避暑庄园。

此外，教会还勾通外国商人向永新倾销商品。使洋货多于国货，从而使永新农村土特产生产和手工业日益衰落下去。

帝国主义势力的人侵已使中国人民难于忍受，而国内大小军阀残酷的掠夺更把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以后，帝国主义豢养的南北军阀多次把江西作为争夺地盘的主要战场之一。大革命以前，军阀陈光远、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孙传芳相继占据江西，永新成了他们割据的地方。为中饱私囊，他们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单是土地税一项就有田赋，田赋附加，田赋积欠等名目。特别是田赋积欠害得许多农民倾家荡产，走上逃亡的道路。如南边村农民周水里一次追缴 25 年的全部积欠，被迫卖掉房产屋宇交税，还不足数，最后只好远走他乡。那时苛捐杂税绝大部分落在农民的头上，地主阶级则可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串通官府，逃避或减轻负担。不仅这样，地主还可向衙门承包租税，并擅自提高税率，扩大征收范围，从中牟利。如洋江土劣汪炳瑞承包厚田乡的烟酒、屠宰税，一年之间就建

房两栋，人民对其深恶痛绝。另外由于北洋军阀南来北去，进进出出，从未间断过军队，他们派捐派款、烧杀抢掠、强奸妇女，使永新人民备受兵灾焚掠之苦。再则由于连年战祸，散兵游勇，到处抢劫，农民无法安居生产，被迫迁徙流亡，以致贼盗蜂起，土匪孳生，全县农村处于混乱不安的状态。

封建豪绅的压迫

地方乡绅集团是直接统治永新的小军阀，他们盘踞在永新的城镇乡村，掌握着全县的政权、军权、财权、文权，成为北洋军阀控制永新的爪牙。大革命以前永新县衙门之下尚无区、乡、保甲等基层机构的设置。当时直接统治永新农村的是体现绅权的三局和书院。三局（即宾心局、续宾心局、采芹局，后来又加入秀水书院成为四局，但通常仍称三局），是县绅集团统治永新全县人民的机构；书院是乡绅集团统治全乡的机构。那时出名的书院有东乡的东山书院，西乡的联珠书院和宗贤书院，南乡的四教书院和道南书院，北乡的莲洲书院。它们和县衙门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县官贪赃枉法，不必担心人民的告发，只要笼络好绅士就可以安然无事；绅士武断乡曲，横行乡里，鱼肉人民也因取得了县衙门的默许，有所恃而无恐。至于那些豪绅地主欺行霸市，草菅人命更是屡见不鲜。二十世纪，永新当权的豪绅有李小戈、肖廷宾、李笑安、贺寿和、刘佩兰、龙兰友、肖实中、刘明安等，他们属头号县绅，上可以左右县衙知事，下可以支配各乡绅，全权独揽当地的一切大小事情。比他们次一等的地方乡绅则各地都有，他们直接控制一区一乡，利用县衙下设的政权，横征暴敛，勒债逼租，霸产夺妻，无所不为。

神权族规的枷锁

宗法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统治永新人民的工具。那时最主要的是家族制。各姓都有宗祠，各族都有族长。把持者大都是各族中的地主和土豪劣绅。他们凭借族权，侵蚀祠款，或借口修谱，修祠，祭祠向本族民众派款勒索。另外利用所谓族法家规，残酷地统治本族人民，对只要他们认为触犯了宗法及冒犯了他们利益的农民，轻则给予“革族”、“打板”，重则予以“沉潭”处死。

封建土地的剥削

帝国主义、军阀和地方乡绅的权力基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一社会制度，经过辛亥革命，上层建筑的名称虽有所改变，但并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据抽样统计，永新在大革命前的土地状况是：占农村总数不到 6% 的地主，却占有农村土地总数的 69%，而占农村人口总数的 70% 的贫民，只占农村土地总数的 11%。另外，还有那 20% 的土地被强宗豪族所掠夺归为祠会所有。但祠会土地名义上是公产，而祠会的管理历来都是掌握在地主豪绅手里，他们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对祠会公产任意侵吞，肆意挥霍，贫苦农民无权过问。祠会的土地实际上还是地主所有。

由于大量土地被地主占有，农民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忍受他们残酷的地租剥削。当时的地租剥削，虽因土地的肥瘠不同而有所差别，然一般收租都在土地收获量的 50% 以上，加上地主的大桶收，浮加田面等额外剥削，剥削率实际超出了 60% 以上。这样，农民

的辛勤劳动果实，就大部分落入地主手中，在收获季节把租谷一交，把债一还，又不免“两手空空泪汪汪”了。地租之高、剥削之狠，往往使得农民在丰收年里出现“禾镰挂上壁，农夫没米吃”的情景。若是碰上灾荒之年，农民生活之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如1918年和1925年的两次大天灾，全县收成减产在五成以上，而地主却以“丰年不加租，歉外不减租”为借口，照旧强迫农民按原额交租，农民为了活命，只得忍痛向地主富农举借高利贷。

高利贷的盘剥，更是敲骨吸髓。高利贷的种类繁多，在永新最利害的有两种：

1、生谷利 当三荒五月之际，农民向地主借谷一担，到禾熟时加五成甚至加倍偿还，称之为“斛斗息”。农民明知这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的办法，但为了活命，也只有咬紧牙关暂救眼前了。

2、典租利 农民以自己的田产屋宇和农具作抵向地主富农借债，利率最低25%，最高达到100%，而且本利相加，逐月计算，谓之“滚雪球”，同时还要限期收回。事实上农民的生活只有越来越苦，哪有钱财在期限内收回自己的抵押品呢？到头来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破产，然后携儿带女的流落他乡。“好汉莫欠典租钱，十欠九死实可怜”。这句农谚正是当时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农民除了苛刻的地租剥削外，还要受名目繁多的种种剥削。其中“六租”和“三酒”就是较为典型的两种。“六租”就是由农民向地主交纳租柴、租草、租油、租茶、租鸡、租鱼；“三酒”即是规定佃农在春节时，须请田主吃“春酒”，夏收前，须请田主吃“新谷酒”。此外，地主家里婚丧喜庆时，佃户还得送礼和服劳役。如恶霸地主龙镜泉每年收受农民馈送的鸡、鸭、鱼、肉、火腿等不计其数。另外，他家每年消耗的柴火，木炭和建房所需要的小工也均由农民承担，无须化一文代价。地主恶霸还挖空心思敲榨农民。如东乡地主左廷中聚赌

抽头，不到一年就建房三栋，买田二百余亩。石桥地主尹笃伦有一次把债户送给的一只狗，转让给一个山区农民，讲明价钱待后再付。后来这个农民把这回事忘记了，不想过了十二年后，尹笃伦却来索债，他用钱折谷、谷折钱，利滚利，把一只狗崽的价款折就成了头大牛牯的价格，这个农民实在偿还不起，只好把整片山林田庄抵充狗款才算了事。当时农民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若要穷得快，笃伦家里欠项债；若要死得苦，廷中家里一场赌。”维妙维肖地刻划了这两个地主的阴险毒辣和贪婪。

永新广大人民不但政治上受欺压，经济受剥削，而且文化上受排挤，贫苦农民几乎完全失去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后来在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办了几所学堂，但由于缴纳不起繁重的学杂费，多数贫苦农民的子弟，都被挡在学校大门之外，而地主阶级却利用其知识，进一步对农民进行愚弄和统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土绅的压榨及封建地主的剥削，激起了永新人民的反抗和自发的革命斗争。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永新县广大民众冲破了长期的沉寂，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

红 土 憤

闹教烈火·反日仇

货·梭子兵

“闹教”烈火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永新人民，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不断激发出革命斗争的火花。“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促进了永新人民的觉醒。从此永新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叱咤风云的反帝爱国运动。

灾难深重的永新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进行过多次的英勇斗争。

1886年间的教会势力猖獗的北乡长湖田农民首先自发地起来暴动。他们驱逐了外国传